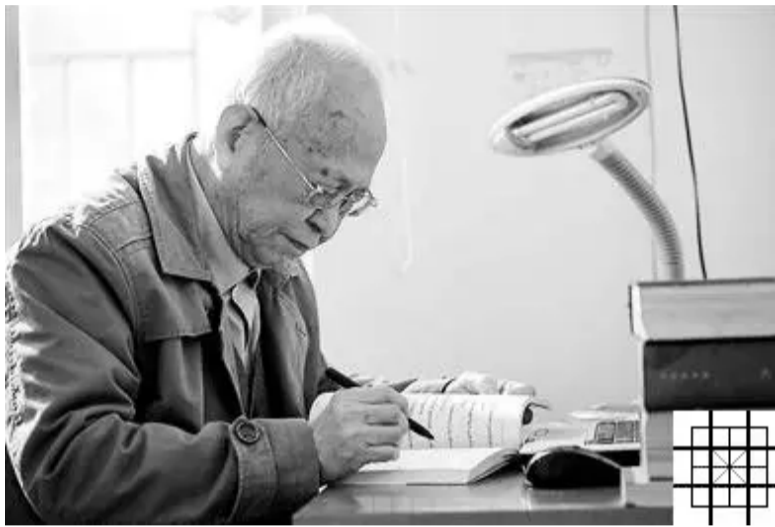


# 36年前国家交给他一个与阿富汗有关的任务，后来国家给忘了（一）



车洪才先生

今年，有一位老人终于了了心愿，因为，国家36年前交给他的任务，他终于完成了。可是……

在打印店打了几份材料之后，车洪才先生小心翼翼地把它们装进包里，来到位于北京王府井大街的商务印书馆。进门之后他也不知道该找谁，直到传达室的人来询问，他才被告知应该去外语辞书编辑室。

编辑室里只有一位小姑娘，问他：“您要出什么书？”

他说：“出一本词典，《普什图语汉语词典》。”

“没听说过。”小姑娘摇摇头。

“大概有多少字呢？”她又问。

“两百多万。”车洪才答道。

她惊讶地抬起

头，赶忙去找编辑室的主任。

当编辑室主任张文英赶到时，车洪才把打印好的词典编写过程、体例说明的材料交给了她。她越看越吃惊，突然发现这本词典在商务印书馆是立了项的，但她却完全没有印象。最后她跑去资料室查档案，结果在一份1970年代的档案中找到了记录：商务印书馆接全国辞书工作会议的指示，组织编写《普什图语汉语词典》，时间是1978年。

这意味着，到2014年即将出版为止，这部词典编了整整36年！

## 被人遗忘的词典

车洪才的儿子车然小时候印象最深的，就是在北京自家的客厅里，摆了一个占据整面墙的柜子。柜子很像是中药房里的药柜，上面有一个个小抽屉，“往外

拉能看到里面是一溜写满字的白色卡片，沉得要命。”

那时候除了父亲，没人能看懂上面写了什么，他也不知道父亲的工作跟这卡片有什么关系。

后来，车然又把把这些卡片统统搬到了厦门，因为怕丢失不敢托运，只好每次坐飞机带一部分，“果然沉得要命，每次都超重。”

这些卡片是车洪才在30多年里积攒出来的，上面写满了普什图语汉语的翻译词条。

这几年天冷的时候，已经退休多年的车洪才就会到厦门儿子家里住上几个月。大多数时候他都对着一台电脑，把卡片的内容输入进去。现在，这台东芝笔记本是他的“宝贝”，里面存着他积累的包括5万个词条、合计250多万字的普什图语汉语词典。

为此他曾经做过两次眼部手术，其中一次是视网膜脱落，早上一起床发现平时个子高挑的孙女怎么成了一条缝？结果第二天就看不见了。然后就是这些年耳朵也听不太清了，左耳比右耳好些，所以家人都习惯站在左边跟他说话。

邻居们不知道的

是，这个喜欢在院子里溜达、有点耳背的老先生，即将完成国内第一部普什图语汉语词典。但事实上，连出版社都忘记了这部字典的存在。

当初负责这部词典的编辑孙敦汉已经80多岁，他还记得当时有两个人脱产来编这个词典，其中一个就是车洪才。“当时没有规定期限，没人知道要做多长时间。”

在他的记忆里后来又开过很多次辞书会议，有的词典又分给其他出版社了，“文革”刚结束也比较混乱，加上两人工作调动的原由，“就渐渐没了联系，出版社也就忘了这回事。”

普什图语是阿富汗的官方语言，主要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西北部使用，建国以来学习这种语言的不到100人，目前长期使用的也就30多人，集中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、新华社、边防和海关等。

“除了这些人，很少有人会用这本词典。”车然一直担心词典无法出版，他托人打听别的出版社，甚至考虑过自己出钱完成父亲的心愿。

“我不着急，这都等了30多年了。”车洪才说，“我心里有底，我编的东西的分量我知道。”

这些年，唯一关注他的词典的居然是一位居住在美国的阿富汗人，车洪才也搞不清他是怎么知道的，“他打电话过来问我的情况，上来先用英语说，然后开始用普什图语，好像在考验我似的。但我答得很好。”这让他有些宽慰。

## 天降大任

在车洪才北京家中的书柜里，大大小小放着他在大使馆工作期间和各国政要的合影。书柜的最深处有一个16开的本子，封面用普什图语和英语写着“毕业证书”，是他在阿富汗喀布尔大学文学院留学后获得的，那里是他和普什图语最早结缘的地方。

1955年万隆会议之后，中国政府开始加强与亚非拉各国的联系，与中国建交、半建交的国家迅速增加。

这时外交部翻译干部数量不足、水平不高的问题日益突出，有几个新建使馆甚至派不出到驻在国的翻译。为了解决这个问题，周恩来指示外交部，从全国各大院校抽调外语系学生去十几个国家学习小语种，即非通用语。还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念大三的车洪才就是被抽调的学生之一。